

元代茶曲创作与茶事生活反映(上)

余悦 高文文

摘要:元曲作为元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体现,囊括了元代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方方面面。本文对元曲作家创作的特点与倾向做了论述,包括元曲作家民族构成,以及元曲中参与茶文化创作作家的地域分布以及生活和创作时期的特点。文章分析了元曲中茶元素塑造的人物形象,并与前代茶文化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相比较,重点总结元曲中的茶文化元素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特点,还与中国古代商人形象作对比。本文试图对元曲中的茶文化创作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梳理、分析、概括,同时论述了前代的“茶酒之争”在元曲茶文化创作的表现,尤其是在文人和百姓生活中的体现。

关键词:茶事生活;茶文化创作;元曲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4)02-0131-07

元曲是可以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的,元代的文化精髓,是研究元代茶文化的重要资料。王国维曾有经典评述:“凡又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自序)]这就极大的肯定了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元曲是元代社会生活精髓的浓缩,是元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是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因此,想要了解并研究元代的茶文化发展概况,从元曲研究着手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一、元代茶曲的创作特点与作者倾向

在漫长的茶文化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唐宋两个朝代的发展高峰。到元代少数民族掌握政权、多民族混杂生活,社会风尚与文化氛围与之前的朝代有所差异。相比唐宋,中国的茶文化出现了一个低谷,没有出现专门的茶书专著,茶文也只有20篇左右,茶诗、茶词也为数不多。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元代多民族大统一的局面,再加上少数民族受中原文化的熏染,茶文化出现了与以往不一样的特征。在文学成就方面,元代虽然没有专门的茶叶专著,但也留下了一些茶诗、茶曲和其他的一些文

学作品,为我们茶文化研究留下了形象的文字资料。尤其是茶曲,其创作既是元代茶事的产物,又体现出作者创作特点与倾向。

(一)元代茶曲的创作特点

从魏晋南北朝中国社会民族大融合以来一直到元代,蒙古族入侵中原,中国社会又迎来了一次大范围的民族迁移——北方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入主中原地带,过起定居生活,原来北方的汉族人民为躲避战乱,迁移到较为偏远的南方。各民族生产方式不同,生活方式相异甚至是风俗习惯也相差甚远。但随着中原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冲突、融合,元曲文人创作又有这一时代的风格特征和内容特点。

第一,少数民族作家参与茶文化创作

“其间蒙古族入住中原建立元朝后,这民族大交流的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加上蒙古族的文化特质,形成了元代较为宽松的思想政治等人为环境。”^[2]很多学者对元代的宽松的人为环境对元曲创作进行过论述。如奚海的《元杂剧论》,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使多民族文人共同致力于文学创作,甚至

余悦,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茶文化;高文文,女,南昌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明清文学与茶文化。

是还有一些女作家参与元曲创作。

由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很多少数民族的文人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也参与了元曲的文学创作。像女真的奥敦周卿,蒲察善长,蒙古族的孛罗御史,高丽庆州的李齐贤等,甚至还有一些西域、大食的文人,他们都在元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些许文章。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还有一批女作家参与元曲的创作,虽没有留下太多关于她们生平的记录,但她们留下了一些文学成果给后人。像参与散曲创作的珠帘秀,刘婆惜,真氏,张氏,王氏。

同样的,元曲中关于茶文化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多民族作家的身影。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茶,茶事甚至是茶俗。如,西域人兰楚芳在作品中就运用了“冯魁”,“茶引”等茶文化元素。被元代人评为第一流散曲大家的维吾尔族作家贯云石,在作品中写道“采茶歌,凭阑干”^{[31](P2895)}。还有被认为与贯云石同人的贯石屏,曾有“咱,睡起时节旋去烹茶”^{[31](P2896)}之句。蒙古族孛罗御史的作品中也有“秋天禾黍,冬月梅茶”^{[31](P2487)}之说。答失蛮氏(回族)的萨都刺曾写“饭饱茶余”^{[31](P2664)}。回鹘的薛昂夫也曾“想茶饭三停里减了两停”^{[31](P2673)}。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相比较汉族的作家来说,文学作品中涉及的茶文化元素较少。但就他们流传于后世不多的文学作品来说,已经算是难能可贵的了。更可贵的是,他们对中原文化的欣赏与接收。

第二,茶文化作家地域分布广

据统计,张月中、王钢主编的《全元曲》中收录了共163篇杂剧作品,其中有52位作家(有名字记载)的117篇,无名氏的46篇。这其中,33位作家(有名字记载)的68篇作品,无名氏27篇作品中涉及到茶事、茶俗等茶文化元素。《全元曲》收录8篇戏文,其中有6位作家(有名字记载)的6篇,无名氏作家的2篇。这其中,有4位作家(有名字记载)的4篇作品,无名氏的2篇作品提到茶元素词汇。还有收录了210位作家的散曲作品,其中有59位作家的作品中有涉及茶文化。

据《全元曲》对这些作家的生平事迹的简略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茶文化作家的生活地域遍布大江南北。北达东北,南到江西、湖南,东到山东,西到西域。这就足以让我们清楚的了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茶文化,在元代已经传播和影响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在茶文化创作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作家多分布在当时的大都(北京),山东,山西,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省。这些地区不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都,就是当

时已经有名气的茶叶生产重地——浙江,江西。如大都的作家就有关汉卿、马致远、记君祥、秦简夫等。浙江的张可久,钟嗣成等。山东的高文秀,武汉臣,康进之,李行甫,贾仲明等。

另外,茶文化作家生活和创作时期集中。以《全元曲》为根据,对当时参与茶文化创作的作家的生活时期和创作时期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茶文化的作家都集中在元代初期和元代后期(元末明初)。这两个时间段都是元代社会相对动荡不安的时期,一个是改朝换代之后,一个是即将迎来社会大变革。社会的动荡,影响着文人内心,使他们也躁动不安,更容易激起创作的欲望。

(二)元代茶曲的创作倾向

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经济政治历史发展趋势与特点。唐代前期文人身处盛世,这给文人带来的更多的是骄傲与自豪,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一种溢于言表的自信和豪放,如李白;后期的社会动荡,又给文学增添了忧愁的氛围,如杜甫。到了宋代,文人身份、地位被极度重视,但当时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一直存在,又经历多次失败改革,外患也一直困扰政权统治,致使文人创作的倾向更加的多样化。文人即对社会充满失望,又对自己带有希望。正是这种犹豫、矛盾、挣扎成就了多倾向的元代文学。元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以及蒙古族严苛的民族政策,对元代的文学创作和文人的思想状况也一定会产生影响。

第一,元曲茶文化创作中的闲情逸致

蒙古族进入中原地带,元代文人效仿晋代、北宋时期文人的作法,大举南迁,躲避战乱,以求得一些安宁。很多汉族的知识分子,在严格的社会分级制度下,感到才不尽用,所以索性游历于山水之间。像吴仁卿就“愁里南闽,客里东吴,梦里西湖”,学陶渊明“赋一篇《归来》”。这在《全元曲》茶文化创作者中是很正常的状态。这些创作者或不致仕,或辞官归家,都学陶学士追求怡然自得的生活。元曲中有很多作品能反映这种现象。周德清【中吕·红绣鞋】《赏雪偶成》:“共妾围炉说话。呼童扫雪烹茶。”^{[31](P2698)}张可久【南吕·金字经】《乐闲》:“远是非,寻潇洒,地暖江南燕宜家,人闲水北春无价。一品茶,五色瓜,四季花。”^{[31](P2764)}王仲元【越调·斗鹤鹑】《咏雪》:“读书舍烹茶的淡薄的多,销金帐里传杯的快活煞。”^{[31](P2877)}汤舜民【南吕·一枝花】《题友田老窝》:“主人自得其中趣。隔墙贯酒,凿壁观书。拾薪煮茗,赁圃栽蔬。”^{[31](P3007)}孙周卿【双调·水仙子】《山居自乐》:“西风篱菊灿秋花。落日枫林噪晚鸦。数椽茅屋青山下。是山中

宰相家。教儿孙自种桑麻。亲眷至煨香芋。宾朋来煮嫩茶。富贵休夸。”^{[31](P3033)}朱庭玉【南吕·梁州第七】《归隐》：“归来好向林泉下。买牛卖剑，求田问舍，学圃耘瓜……客来汲水自烹茶。”^{[31](P3056)}李德载【中吕·阳春曲】《赠茶肆》：“蒙山顶上春光早。扬子江心水味高。陶家学士更风骚……一瓯佳味侵诗梦，七碗清香胜碧筒……免毫盏内新尝罢，留得余香在齿牙。一瓶雪水最清佳，风韵煞，到底属陶家。”^{[31](P3063)}【双调·雁儿落过得胜令】《闲居》：“功名梦不成，富贵心勾罢。青山绿水间，茅舍疏篱下。广种邵平瓜，细焙玉川茶，遍插渊明柳，多栽潘令花。”^{[31](P3090)}这些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情致，或自得其趣，或与友共乐，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效仿陶渊明，远仕途，亲自然，在田园交友中获取人生乐趣的倾向。

第二，元曲茶文化创作中的道家倾向

元曲茶文化作家们弃仕途，返自然，追求平淡朴实的心态与老庄的“无为”哲学暗合。这无疑也表明了元曲作家对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接受与欣赏。

逍遥神游，羽化成仙是道家思想中的主要教义。李德载小令《赠茶肆》：“龙团香满三江水，石鼎诗成七步才，襄王无梦到阳台。归去来，随处是蓬莱……两腋风，人在广寒宫。龙须喷雪浮瓯面，风髓和云泛盏弦，劝君休惜杖头钱。学玉川，平地便升仙。”^{[31](P3063)}在这则小令中“蓬莱”、“广寒宫”、“升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仙境。作家通过饮茶便能达到内心中仙境。这无疑把茶、曲与道家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

道家成仙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炼丹。崇尚道家学说之人通过服食丹药，可以使自己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王立霞曾在论文中摘引《元诗选》初集（下）《霞外集》序：“茶文化的养生思想，也明显地体现在茶文学中比较普遍的茶、药同境共咏之中，茶与药被视为同一义列。”元曲中也有运用这一思想，把茶药并提的作品。《全元曲》中5次在不同的作品中写道“茶药琴棋”。乔吉【南吕·玉交枝】《闲适二曲》：“自种瓜，自采茶，炉内链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闭上槿树篱，醉卧在葫芦架，尽清闲自在煞。”^{[31](P2622)}

还有遁世隐逸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张可久【双调·湘妃怨】《山中隐居》：“写十卷《续仙传》，和一篇《陋室铭》，补注《茶经》。”^{[31](P2814)}元曲中茶文化创作者有一些始于仕而终于道，信道慕仙而归隐于山林的，邓玉宾就是。其在【中吕·粉蝶儿】【幺】中云：“挽下藤花，班下竹笋，采下茶苗。化下道粮，攒下蔬菜，蒲团闲靠，则待南窗和世人相傲。”^{[31](P3030)}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往往借助一些高雅

清洁的意象来表现自己创作中的道家思想，如松、竹等。元曲中也有这样的创作。张可久【越调·天净沙】《赤松道宫》：“松边香煮雷芽，杯中饭糝胡麻，云掩山房几家？弟兄仙话，水流玉洞桃花。”^{[31](P2757)}【中吕·喜春来】《永康驿中》：“荷盘敲雨珠千颗……芳草坡，松外采茶歌。”^{[31](P2767)}宋方壶【中吕·山坡羊】《道情》：“布袍粗袜，山间林下，功名二字皆勾罢。醉联麻，醒烹茶，竹风松月浑无价，绿绮纹楸时聚话。”^{[31](P3089)}【双调·水仙子】《隐者》：“青山绿水好从容，将富贵荣华撇过梦中。寻着个安乐窝胜神仙洞，繁华景不同，忒快活别是个家风。饮数杯酒对千竿竹，烹七碗茶靠半亩松，都强如相府王宫。”^{[31](P1380)}这些高雅之物，更衬托的作者仙风道骨，也只有真正的“隐士”才能理解松竹的高贵品格。

第三，元曲茶文化创作中的禅寂倾向

赵州禅师“吃茶去”的公案开启了“禅茶一味”的先河。从此之后，茶就与禅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元曲中有诸多体现“茶禅一味”思想的作品。

杨景贤《西游记》第二十二出《参佛取经》【幺】：“你若能尝佛子茶，胜参赵老禅。”^{[31](P1380)}杨朝英【双调·水仙子】《自足》中写道：“客到家常饭，僧来谷雨茶，闲时节自炼丹砂。”^{[31](P2914)}前者体现了作家在生活中对禅茶的理解，后者反映了作家与僧人交往饮茶。

在《全元曲》中出现有关禅家思想的词汇是“茶烟”。文人笔下的茶烟更多的文人内心中的一种感悟与境界，对佛家而言，茶烟更是一种禅悦。品茶与参禅水乳交融，二者共同追求的是主体境界的升华。张可久【越调·凭阑人】《海口道院》：“雨后松云生紫岩，花外茶烟生翠岚。袖诗出道庵，探梅来水南。”^{[31](P2817)}“乱飘僧舍茶烟湿”这句词，在《全元曲》中共出现过3次，分别在不同的散曲中。作者无非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意境。由于《全元曲》中记载的茶文化资料不多，关于禅与茶的创作留存下来的也就很少。但是，我们还是从中禅文化对茶文化创作的影响。

二、元代茶曲中的茶商形象

政权建立以后，元代的统治者也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经济生产。虽经济发展水平不能与前代的水平相提并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繁荣。元代经济的发展直接带来社会的发展，这些都在时代的文学中有所反映。元代茶叶经济和社会发展下的茶人形象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这个时代的特色。这里的茶人不仅包含茶商而且还包含饮茶之人。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形象出现，贩茶者的形

象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之前很少有人对此作出分析。贩茶者的形象塑造取决于当时中国茶叶经济的发展状况,反过来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程度。虽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没有为贩茶者留下太多的文字,但其在茶文化史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由于记载相对较少,可在有限的资料中,我们依然可以概括出一些清晰的贩茶者文学形象。并借助这些贩茶者形象的塑造,分析当时中国茶文化甚至是茶叶经济的发展动态。

在这里,贩茶者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主要包括与茶叶经济有联系的人。不仅仅是指贩卖茶叶的茶商,也指一些在茶馆卖茶或是挑担卖茶水的小贩甚至是茶农。

魏晋时代茶文化的萌芽,重要表现之一是茶与文学开始结缘。不过,这时的茶诗还只是处在初期,只是吟咏他物,兼涉茶叶,而不是象后来的一些作品那样专门以茶为主题,进行细致描写。^{[4](P15)}但即便是这样,还是会有一些关于茶文化零星的记载。

在中国茶文化萌芽的魏晋时代,作为茶文化载体的茶馆也开始其初级阶段的发展。形式最简单不过的就是茶摊。这些茶摊的流动性很强,一般都是贩茶者提着篮子、茶担或是小车卖茶。这种景象在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所描绘。但事实上这种茶摊兴起于魏晋时代。《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傅中丞集?司隶教》中“闻南方有蜀姬作茶粥卖,为廉事打破其器具,后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嫗,独何哉?”^{[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茶文》P4,《司隶教》)}这短短的几句话,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卖茶老嫗艰难的生活困境。还有就是当时政权对茶贩、茶摊这种经营方式的不支持。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广陵耆老传》中:“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所得钱散路傍孤贫乞人。人或异之,州法曹繫之狱中,至夜,老姥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5](《隋唐五代茶著》,P22)}这个故事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在简短的文字中就刻画了一位心地极其善良,又乐善好施的神仙妇人。这也成了贩茶者文学形象刻画的一个开始。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魏晋时期,一方面茶饮已经在大众中有了很高的普及程度,出现了“往市鬻之,市人竞买”的买卖现象;另一方面从这样的茶摊也看出,中国古代茶文化以及其载体还处在茶担、茶摊这样比较低级的阶段,茶叶经济发展还不全面,形式单一。

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大放异彩的隋唐时期,中国古代茶文化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也经历了一个兴盛时期。尤其是唐代,其茶文化的发展以及取得的成就也使其在中

国古代茶文化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了后世无法超越的高峰。

在隋唐五代的茶文化经典著作中,首先不能不提的就是《茶经》。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陆羽也由此被称为中国茶道的奠基人。但是在《茶经》中,关于当时贩茶者的记载很少,零星的记载只是陆羽摘录前人的文集,像《司隶教》与《广陵耆老传》。在《茶经》中还摘录了宋《江氏家传》:“江统,字应元,迁愍怀太子洗马,常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醢、面、蓝子菜、茶之属,亏败国体。’”^{[5](《隋唐五代茶著》P23)}是说,江统上书反对茶叶买卖,认为有损国体。国家政权反对茶叶自由买卖。我们能想象出那些从事茶叶买卖的小商贩是怎样的生活状态。虽然后来的学者考证:“查《晋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江统》,文字与陆羽引文有异,摘录如下:江统,字应元。统上书谏曰:‘秦汉以来,今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闻。’全篇没有卖茶的话。”^{[5](《隋唐五代茶著》P23)}也就是陆羽在摘录的时候出现了差错。但是这也说明茶文化到唐代时期,文人已经关注茶人并塑造茶人的文学形象。

唐代一些著述对当时茶叶经济的发展景象有很多描写,如封演的《饮茶》:“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5](《隋唐五代茶著》P32)}这里就描绘了不管是茶水贩卖还是大宗茶叶运输的繁荣景象。《全唐文》中也收录了很多篇关于禁盗卖私茶的奏折。当时民间私自贩卖茶叶已经引起当朝的关注。还有杜牧的《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中“所劫商人,皆得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于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凡千万辈,尽贩私茶。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5](《隋唐五代茶著》P33)}不管是奏折里还是上书中,贩茶者多是些不顾国家朝廷利益的走私之辈,匪盗之徒,甚者无恶不作。这些文献资料虽不是直接的文学形象塑造,但是这些记载对文人进行贩茶者形象刻画产生很大影响。

唐代文学中对后来贩茶者形象塑造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就是白居易的《琵琶行》。白居易描写道:“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6](P962)}“重利轻离别”寥寥几字,就刻画了一个为金钱利益驱使,不顾家人的薄情郎的形象。这个形象也为后来的贩茶者形象塑造奠定了一个“薄情郎”的基调。

总的来看,唐代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很多直接刻画的贩茶者文学形象,而现实贩茶的形象多出现在一些历史文献记载中。唐代的贩茶者形象就是一些重利轻义,走私匪盗之类的形象,缺乏正面健康的形象。

到了宋代,这一时期的茶文化又出现了不一样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比如,饮茶方式的转变,由唐代的煎茶法变为点茶法。不过,与茶文化大发展的对比就是,关于贩茶者文学形象的正面描绘刻画少之又少,文人更多的是倾向于对茶本身的赞美,或是文人之间关于茶的相互唱和,更或是文人自己内心情感的抒发。即便是有对贩茶者的描写,也是把贩茶者描写成凶恶之人。如梅尧臣的《闻进士贩茶》:“山园茶盛四五月,江南窃贩如豺狼。顽凶少壮冒岭险,夜行作队如刀枪。浮浪书生亦贪利,史笥经箱为盗囊。”^[51](《宋代茶文化经典》P141)诗歌更是直接的把贩茶者比作豺狼,还批判浮浪书生为了贪图利益,放弃读书。由此看出,诗人对贩茶商人的厌恶之情。

在中国封建时代,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这也成就了其在中国茶文化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冲突使茶文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最明显的是有关茶文化文献记载与有关茶文化的文学创作数量上的减少。同样因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各方面交流的频繁,自然使得这一时期的茶文化出现了不同的内容。

史料记载,元代有了专门经营茶叶的商户,也设立了榷茶都转运司来专门管理茶叶经营,商贩要购买“茶引”作为运输茶叶的凭证。元代也有了相对比较完整的茶法。政府一方面设立很严苛的禁榷制度,另一方面又保护商户进行茶叶的运输与自由买卖。

在大的背景趋势下,元代的饮茶习俗日益普遍,人们已经习惯了“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另一个方面,文学发展到元代又出现了新的样式——元曲。《全元曲》中自然少不了反映当时茶文化繁荣发展的景象。

《全元曲》中有一些描写贩茶者(茶商)的记载。有一些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文学形象。像“浮梁茶客”、“茶商刘一郎”、“冯魁”、“茶三婆”、“茶员外”。

在《全元曲》中有很多关于“冯魁”的描写。关汉卿《杜蕊娘智赏金钱池》:“我是他亲生的女,又不是买来的奴,遮莫拷的我皮肉烂,炼的我骨髓枯,我怎肯跟将那贩茶的冯魁去!”^[17](P24)《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却则为三千张茶引,嫁了冯魁。”^[13](P62)还有《嘲人爱姬为人所夺》

“村冯魁沾的上,俏苏卿随顺了,双渐盃盃。”^[13](P2638)周德清【越调·天净沙】《嘲歌者茶茶》:“根窠生长灵芽,旗枪棚立烟花,不许冯魁串瓦。休抬高价,小舟来贩茶茶。”^[13](P2699)王举之【南吕·金字经】:“贩茶船,买命钱。占得先春,到称了冯魁愿。”^[13](2864)刘庭信【正宫·醉太平】《走苏卿》:“一船茶单换了个女妖娆……村冯魁老曹。”^[13](P2937)这里都写道了“冯魁”。在这些场景中虽然不是直接描述“冯魁”的性格形象,但是借助别人对“冯魁”的反映,我们依然能够总结出冯魁的形象:薄情、蛮横,依靠一己财力霸占佳人。这种侧面刻画的方式让冯魁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江州司马青衫泪》中马致远生动的塑造了一个薄情浮梁茶客刘一郎的形象——“浮梁茶客刘一郎,要来和孩子吃酒,孩儿百般不肯。今日他说要自来,等来时再做计较。”“他去之任,被茶商刘某妄报他死,拐骗为妻”^[13](P392,399)。在作者笔下,刘一郎是一个势力奸诈、心胸狭隘、薄情又夺人所爱的浮梁茶客。冯子振【正宫·鹦鹉曲】《四皓屏》:“薄情郎又泛茶船,近日又浮梁去。说相逢总是天涯,诉不尽柔肠苦处。”^[13](P2546)这两个场景与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白居易的语言极为简洁,但两者都描写了一个重利、薄情的茶客形象。以致到后世文学人物形象中,一提到“浮梁茶客”就使人联想到薄情寡义之人。

马致远在《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又塑造了另外一种茶商形象——郭马儿。

第二折:“(柳改扮郭马儿引旦儿上。诗云)……自家郭马儿是也。这是我浑家贺腊梅。在这岳阳楼下开着一座茶坊……但是那过往的人剩下的残茶,我都吃了他的……(正末上,云)……过往君子吃剩的残茶,此人便吃了。虽然如此,争奈浊骨凡胎,无人点化……”本是柳树托生的郭马儿,在茶坊中干着卖茶的营生,经常会吃掉茶客剩下的残茶,折射出郭马儿的卑微和庸俗,用吕洞宾的话说就是“浊骨凡胎”。这是一种区别于薄情寡义,重利轻义的形象之外的一种,以卑微低贱的心态过活的茶商形象。

在《钱大尹智勘绯衣梦》第三折的场景中塑造了一个活生生“茶三婆”形象。文章中的“茶三婆”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茶坊主管。作者把“茶三婆”塑造成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人。茶三婆的“巧舌”让我们体会到他们的辛酸,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茶三婆”在文中成了贯穿文章的关键。

根据《全元曲》中资料记载总结,贩茶客们大都倚仗雄厚经济实力,生活奢靡,经常出入妓院青楼,有的又夺人所爱,后又薄情多变。虽然这些杂剧没有直接以“茶”作为主角,而主要是描绘茶商、妓女、文人的情事纠葛,但应是真实的反映了元代当时的社会问题。人们的饮茶习俗日渐普及,茶叶的消费量也逐渐增大,但茶叶的主要产区又大量分布在南方,这无疑给贩茶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虽然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但另外一个角度看去,正是元代茶叶经济的繁荣发展才造就了这些茶商的“财大气粗”。

还有一类茶商,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不同于以上的茶商,没有以上茶商的财气。他们是茶馆的服务人员——茶博士。宋代王谠编撰的《唐语林校证》中有一篇名为《煎茶博士》记载道:“茶毕,令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31](P62)}到了元代,《全元曲》中大力描绘了“茶博士”这些茶馆服务人员的生动形象。关汉卿《钱大尹智赚绯衣梦》第三折“(茶博士上,云)吃了茶的过去,吃了茶的过去。俺这里茶迎三岛客,汤送五湖滨开开这茶铺儿,看有甚人来”。^{[31](P108)}一开场就是茶博士一段流畅的开场白,再加上后来茶博士的一些巧言妙语,就看出在茶馆中营生的茶博士多是些性格活泼外向,能察言观色,又能言善辩的人。还有李德载【中吕·阳春曲】《赠茶肆》“茶烟一缕轻轻飏,搅动兰膏四座香,烹煎妙手赛维扬。非是谎,下马试来尝。夸妙手,博士便风流。”^{[31](P3062)}其中这些话,无不透露着作者对这些茶博士的精湛冲泡技艺的赞赏。茶博士的这些高超的茶艺已经成为元代茶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不仅仅是在喝茶,更是在欣赏茶博士的茶艺,从这些技艺中得到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由此看来,元代的茶饮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解决人们生理饥渴的层面,更向着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层次发展。这无疑也是茶叶经济发展下催生的文化产物。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二煞】:“争如我盖间茅屋临幽涧,披片麻衣坐法坛。倒也躲是非忘荣辱无牵绊,不强似你在人我场中,把个茶博士终朝淘渲”^{[31](P416)}也在侧面反应了茶博士艰辛的生活状态。

总之,元代茶文化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生动的文学形象,而这些文学形象又更深层次的加深了人们对元代茶文化的理解与体会。

明清时期对于贩茶商人形象鲜有记载。这就使中国文学史上贩茶者形象单一,缺乏发展性。贩茶者多以薄情寡义,目无法律,奸诈狡猾这样的形象存在。造成的这种局面有其思想上和社会经济上的原因。思想上,文人

深受农本位意识的影响,对商人没有相对客观的认知;文人本身所具有的清高孤傲与商人的“无商不奸”对比,更是让其对商人充满了鄙夷的情愫。经济上,历朝历代都有严苛法律来管制茶叶的自由买卖,再加上重利的诱惑,造成有一些私贩茶叶的商人的存在。他们的一些违反社会法律的行为,在维护正统利益的文人看来,自然对这种行径嗤之以鼻,再加上文学的塑造就形成了文学史上贩茶者既定形象。

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上,商人形象塑造一直是文学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人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形象生动的商人形象。因为茶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贩茶商人也就成了中国古代商人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贩茶商人形象自然成为商人形象的一个分支。仔细比较之下,这两种群体人物形象塑造有所不同也有所不同。

相同的是,在文学史上所塑造的贩茶商人大多是些重利轻义,薄情寡义的无良商人。他们不懂得情谊的珍贵却一味的追逐金钱的价值。中国文人向来最看轻的就是这种商人。中国古代文人在长期的小农经济影响下都有着强烈的农本位和重农抑商的思想,自然将商人作为批判的重点对象,塑造的商人形象也多是些奸诈投机之徒。

在中国广泛流传着一句形容商人无良的俗语——“无商不奸”。从这句俗语就看出人们,不仅仅是文人对商人那种鄙夷的态度。元稹《估客乐》中写道“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17](P268)}这两句话尽显商人的不诚信,为了一己私利弄虚作假,欺骗大众。《三言两拍》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文中提到了一位漂泊在外的商人——孙富。孙富利用“功心计”,致使李甲出卖杜十娘,最终导致了杜十娘的悲凉结局。虽然李甲是致使杜十娘死亡的罪魁祸首,但是孙富的从中挑拨,也使他成了李甲的“帮凶”。孙富俨然成了一位依靠自己的财力,诱拐佳人,欺骗朋友的奸商。另外,在《水浒传》中还有一位名声在外的“王婆”。王婆为了西门庆的“财礼”,暗中撮合西门庆与潘金莲,这已是诱拐良家民女。更甚的是,王婆为了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撮使潘金莲谋杀武大郎。王婆是导致武大郎死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王婆的这种恶行也成了商人重利轻义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还有西门庆仗着自己的财力和地位,诱骗良家女人,显然超出了中国文人所倡导的“礼”,自然受到文人的鄙夷与批判。文人对商人恶行的批判,是在以他们微薄的力量监督社会风气,倡导礼仪文明。这是

文人对社会该尽的责任。

不同的是,并非所有的文人对商人都是持批判的态度的。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很多正面的商人形象。“富者,人之性情”^[81](P3271),这句话与“食色性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司马迁的这句话肯定了商人通过自己辛勤劳动致富的良好品质。追求财富这是人的本性,这没什么低贱的。同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一些正面的商人形象,“凡言富者皆称陶朱公”^[81](P3257)的陶朱公,“天下言治生祖白圭”^[81](P3259)的白圭。这两个人一直被商界视为传奇。更传奇的是,两人的人生经历,一个相传是春秋时期帮助勾践成就大业的范蠡,另一个也曾高居魏相。两人在官场与商场的成功要归功于两人的人生智慧,这其中他们的智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情商才是成就伟业的根本。相传范蠡为相时,放弃功名,与美人泛舟西下,这是何等的情怀。白圭曾经把成功商人的形象概括为“智、勇、仁、强”,这也需要极高的人生境界才能看得如此透彻。两人是商人正面形象的代表。

商业发展到明清时期,越来越多的商人以“儒商”自居,也把“儒商”名号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崇尚儒家道义的文人与儒商之间似乎因为一个“儒”字,找到了有效的沟通途径。文人也倾向于赞扬“儒商”的高洁情怀。所以明清时期,出现了很多重情重义,乐善好施的“大善人”。他们通过自己勤勤恳恳的劳动成就了自己的家业。如冯梦龙《醒世恒言》中《刘小官雌雄兄弟》中通过诚实劳作,一两年就挣下老大家业的刘奇和刘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更乐于赞扬他们的“仁爱之心”,那种“乌鸦反哺”回馈社会的人生境界。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小二》,通过苦心经营致富后,“俱量给资本”^[91](卷三 P382),资助村里贫困者,让他们做生意,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摆脱贫困。这般仁义,使小二成了儒家文人颂扬的典型。

文人对商人的批判一方面源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农本位思想,另一方面也源于商人职业素质低下引起的社会反感反映到了文学中。但是文人对商人正面形象的赞许,一方面暗含着文人对商人职业素养的期许,另一方面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商人中真正地出现了很多正

面的商人形象反映到文学上。

中国文学史上的商人形象还是较为全面客观的总结分析了这个群体的整体形象,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贩茶者“重利轻别离”的主流形象与之相比,贩茶商人中缺乏崇尚儒家伦理道德的正面形象,而且缺乏历史发展性。

贩茶者的形象由最初的无文学记载,到最后出现文学史料记载甚至形成固定的形象,这其中经历着中国的茶叶贸易的由小到大和茶叶经济的由强到弱。经济的发展带动文化的繁荣,茶叶经济的发达促进茶文化的发展。茶文化流传到今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塑造的贩茶者人物形象不仅为当时也为现代的茶文化和文学爱好者带来不一样的享受。

[参考文献]

-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2]云峰.试论元代较宽松的思想政治等人为环境对元杂剧繁荣兴盛之影响[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8)
- [3]张月中,王钢.全元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 [4]余悦.茶路历程——中国茶文化流变简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 [5]陈彬藩,余悦,关博文.中国茶文化经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 [6](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7](唐)元稹撰,冀勤点校.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8](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汇校汇注汇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待续)

责任编辑:施由明